

# 菲利普·柯丁的比较世界史研究\*

魏孝稷

【提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菲利普·柯丁针对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和传统世界史编纂的空洞化问题,提出了比较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贸易”“种植园”“西方的扩张”“大西洋史”“全球移民史”“全球医疗史”等议题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可实证化的方向。而且,柯丁通过设立“比较世界史”研究生项目,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世界史学者,他们成为当今西方世界史研究的中流砥柱。因此,总结菲利普·柯丁的比较世界史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菲利普·柯丁 比较世界史 个案分析 全球史研究

菲利普·柯丁是美国非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先驱,<sup>①</sup>亲身经历了非洲史和世界史学科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sup>②</sup>当前世界史研究已经蔚为壮观,而一批杰出的世界史学家为此做出过巨大贡献,包括威廉·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菲利普·柯丁、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名学者,他们依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开拓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成为开风气的先驱人物。<sup>③</sup>其中菲利普·柯丁的贡献可谓独树一帜,他首倡的比较世界史方法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比较方法被重新重视的今天,总结柯丁比较世界史的治史理念、方法和成就,对于理解世界史的发展过程和推进史学实践都有重要意义。<sup>④</sup>

## 一、柯丁比较世界史的出发点

菲利普·柯丁1922年出生于费城,本科就读于著名的斯沃斯莫尔学院。珍珠港事件后,柯丁的学业中断,但是他基于反战的坚定信仰,拒服兵役,被安排在美国商用海事局(U. S. Merchant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23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柯丁在非洲史和世界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地位,著名世界史学者帕特里克·曼宁评价说,柯丁“是当代历史学在非洲史和世界历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人”,“在非洲史和世界历史领域,柯丁都是引领研究导向的重要作者,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缔造者”。参见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田婧、毛佳鹏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1页。

② 柯丁在回忆录中提到,非洲史和世界史曾经是边缘学科,现在已经被新一代的历史学者接受,成为学术主流的一部分。参见Philip D. Curtin, *On the Fringes of History: A Memoir*,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0。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西方史学话语当中,“世界史”的概念是与“区域国别史”相对应的,一般可以与“全球史”的概念互换,本文中的“世界史”或“比较世界史”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的。

③ 参见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0—81页;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69—97页。

④ 近些年来比较方法日益受到世界史学者的重视,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参见夏继果《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James Belich, et al., eds., *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

Marine)担任电报员,任职期间得以游历世界,同时对非西方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sup>①</sup>1948年,柯丁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方向是英国殖民时期的牙买加史。不同于传统的英帝国史研究,他采用牙买加的地方档案而非伦敦的帝国档案作为主要的研究依据。从此以后,柯丁的研究都带有边缘的和底层的视角。<sup>②</sup>1953年,柯丁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到母校斯沃斯莫尔学院教书,此时他开始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加勒比海地区转向了非洲,成为较早一批研究非洲史的白人学者。三年后,柯丁转入威斯康辛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柯丁的教学和研究实践逐渐成熟,发表了一系列成果。<sup>③</sup>1975年他转入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任职期间又出版了多部视野宏阔的经典著作。<sup>④</sup>1983年,鉴于对历史研究的突出贡献,柯丁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是对他前期学术成就的肯定。2009年,柯丁于宾尼法尼亚的西切斯特逝世,享年87岁,直到去世前他仍笔耕不辍。

柯丁早期的经历和学术实践已经使他对当时的美国史学产生强烈的不满,他认为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西方中心或美国中心的史学叙事。1978年,柯丁在一篇采访中追忆30年前美国历史教育的状况时提到,当时美国教授的历史只不过是美国和西欧的历史,非西方的历史被严重忽视。<sup>⑤</sup>在柯丁看来,十几年过去了,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观。他在1964年出版的《非洲史》小册子中批评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念,他说“过去的历史叙述,不是试图根据现代世界的历史来解释它,或者去追踪人类文明的兴起,而是从美国出发,探求美国文明的根源。实际上,这就是基于美国立场‘向后推讲历史’(history taught backward)——回顾北美大陆的殖民时期,然后回溯到欧洲,再回溯到西方中世纪、罗马、希腊,以及近东的古代文明。”<sup>⑥</sup>这种“向后推讲历史”是当时历史教育的普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非西方的历史是缺位的,西方与非西方相互影响的历史也是缺位的。

柯丁认为美国史学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研究的专门化(specialization),这种现象因区域研究的兴起而愈演愈烈。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服务于美国全球霸权需要的区域研究日益盛行。区域研究的对象虽然包括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但是这种研究本身也带有与生俱来的弊病,选题日益专深化,研究者彼此缺少对话,造成了知识碎裂化的局面。<sup>⑦</sup>1983年,柯丁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发言中就指出了史学专门化带来的深刻问题,他说“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历史学科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历史学家却没有有什么进展。我们教授非洲和亚洲的历史,但是美国史的专家对非洲历史的

① Philip D. Curtin, *On the Fringes of History: A Memoir*, pp. 40-44.

② 1955年,柯丁的博士论文出版,题名《两个牙买加人》,参见 Philip D. Curtin, *Two Jamaic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③ 柯丁此一时期非洲研究的成果有 *The Image of Afric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African History*, Macmillan & Co., 1964; Philip D. Curtin, ed., *Africa Remembere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Philip D. Curtin and Paul Bohannon, eds., *Africa and Africans*,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1; *Precolonial Af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74;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2 Vol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5。

④ 参见菲利普·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鲍晨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Disease and Empire: The Health of European Troops in the Conquest of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Rise and Fall of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gration and Mortality in Africa and the Atlantic World, 1700-1900*, Variorum, 2001。

⑤ Philip D. Curtin and Femme Gaastra, "Interview with Philip D. Curtin" *Itinerario*, Vol. 2, No. 1, 1978, p. 20.

⑥ 转引自 Craig A. Lockard, "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ip Curtin and the 'Wisconsin School' 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in Ross E. Dunn, ed.,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St. Martin's, 2000, p. 59。

⑦ Philip D. Curtin, "Foreword", in Michael Adas, *Prophets of Rebellion: Millenarian Protest Movements against the European Colonial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p. xi.

了解并不比他们的前辈在 1940 年了解得多。我们有黑人史、妇女史和历史人口学方面的专家,但是这些专业以外的人很少注意他们的工作。历史研究的领域变得更加广泛,成果更加丰富,然而,对历史学者的培养却变得更加狭隘……新一代的亚洲研究学者和非洲研究学者对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美国史学者对欧洲历史的了解比 30 年前反而更少。”<sup>①</sup>

当然,柯丁也注意到当时存在一种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对象的史学书写形式,即“世界史概览”(World History Survey),但他认为这一史学形式恰恰体现了美国史学的第三个弊病。20 世纪早期,美国中学历史课程设置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改革,改革之后,高中学生要修一门世界史概览课程,以“世界史概览”为题的教材不断涌现。<sup>②</sup>柯丁认为这种通史教材的编写,内容空洞浅显,观点陈旧,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缺乏联系和比较,被机械地堆在一起,混乱不堪,不可能使读者获得真正的历史理解。<sup>③</sup>也就是说,旧的世界史虽然能够提供较为广博的历史知识,但是流于表面,缺乏历史学特有的深度和洞察力。

为避免美国史学所面临的上述问题,柯丁探索了新的史学理念。他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演讲题目凝练了一生治学的理念,即“深度、广度与关联性”。<sup>④</sup>简言之,柯丁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应该同时满足“通广性”(broad generalization)和“专深性”(specialization)两个目标,故而“最好的理解来自专通知识的巧妙结合”。<sup>⑤</sup>所谓“专深性”是指发掘史实并阐释其深意,所谓“通广性”是指观照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柯丁认为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探索并解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sup>⑥</sup>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是极其困难的,绝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在史学专深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少数历史学家留有几部经典的通广性著作,往往备受争议。柯丁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方法,他称之为“比较世界史”。

柯丁曾经给出一个“比较世界史”的定义,他说“‘比较’,是因为它概括……特定现象,并从中寻找相似点及不同点,‘世界’,是因为它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而非要囊括所有地区的活动,‘历史’,是由于它涉及的是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发生的变化。”<sup>⑦</sup>实际上,这个定义并没有准确地描述出“比较世界史”的特征,比如它不能与一般的“比较史”区别开来。后来,柯丁在一篇文章中又做了补充,他说“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史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比较跨越主要文化区边界的历史现象,并找出相似性或差异性。”<sup>⑧</sup>因此,根据柯丁的解释,比较世界史是比较史的一个分支,但有独特的研究对象。顾名思义,“比较世界史”比较的是“世界史”。在美国的历史学科设置中,“世界史”是与“国别区域史”相对应的,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跨越地理、文化、国家边界的历史现象。一言以蔽之,“比较世界史”就是对相似的或共同的“跨区域”现象进行比较研究。<sup>⑨</sup>这种方法包含两

① Philip D. Curtin, “Depth, Span, and Relev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 No. 1, 1984, p. 1.

② 参见吉尔伯特·阿勒代斯《走向世界史历史——美国历史学家与世界历史课程的问世》,夏继果、杰里·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9—104 页。

③ Craig A. Lockard, “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ip Curtin and the ‘Wisconsin School’ 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pp. 60—61.

④ Philip D. Curtin, “Depth, Span, and Relevance”, pp. 1—9.

⑤ Philip D. Curtin, “Graduate Teaching in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 No. 1, 1991, p. 82.

⑥ Philip D. Curtin, “Interview with Philip D. Curtin”, p. 20; Philip D. Curtin, “Foreword”, in Michael Adas, *Prophets of Rebellion: Millenarian Protest Movements against the European Colonial Order*, p. xiii; Philip D. Curtin, “Depth, Span, and Relevance”, p. 3.

⑦ 菲利普·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前言”,第 1 页。

⑧ Philip D. Curtin, “Graduate Teaching in World History”, p. 82.

⑨ Philip D. Curtin, “Interview with Philip D. Curtin”, p. 20.

种要素,一是“比较”,二是“联系”。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可以增加历史学的广度,但是可能在深度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柯丁加入了第三种要素,即个案分析法。他认为,个案研究虽然只能部分地反映宽广的历史进程,但是可以接触一切优秀的历史著作赖以存在的经验数据。历史学家无法获得全部真相,也不可能告诉我们所有的局部真相,只有通过个案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得出部分史实之总和,才可能更好的理解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sup>①</sup> 个案研究使比较世界史具备了实证基础,使得研究视角聚焦到某个专题上,然后利用大量一手资料解决具体的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追求历史“深度”的目标。

实际上,柯丁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尝试将比较世界史的方法用到教学当中。1954年,柯丁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给本科生开设一门课程“欧洲的扩张”,后来课程名称改为“世界与西方”,他虽然先后转入威斯康辛大学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但这门课一直上到1998年。<sup>②</sup> 2000年,柯丁将这门课的讲义整理成专著出版。<sup>③</sup> 据他总结,这门课的特点是“比较方法,个案研究,运用文化语境,着重强调多维度的互动”。<sup>④</sup> 柯丁还将比较世界史的方法运用到研究生培养当中,成为世界史研究生教育的一位开拓者,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59年,他与同事东南亚专家约翰·斯梅尔(John Smail)等人在威斯康辛大学开设“比较热带史项目”(Comparative Tropical History Program),培养博士研究生,致力于对非洲、拉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一般认为,这是美国第一个正式的世界史研究生课程。<sup>⑤</sup> 柯丁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设立这个项目的目的也很明确,即为了“帮助非西方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避免历史知识的碎片化而提供的一个训练方法”。<sup>⑥</sup> 不久,“比较热带史项目”扩展为“比较世界史项目”(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Program),与前者比起来,后者的研究范围更为宽广,柯丁的研究方法也因此得名。

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早期大概有100名博士研究生通过“比较世界史项目”获得博士学位。<sup>⑦</sup> 很多毕业的博士已经成为美国其他高校颇有成就的世界史学者或者带有世界史背景的区域史研究专家。像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罗斯·邓恩(Ross Dunn)、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富兰克林·奈特(Franklin Knight)、帕特里克·曼宁·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等人,他们现在是世界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有学者把秉持这一理念和跨文化比较方法的学术团体称作“威斯康辛学派”。<sup>⑧</sup>

① Philip D. Curtin, “Preface”, 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p. xi.

② Philip D. Curtin, *On the Fringes of History: A Memoir*, p. 68; 这门课的大纲参见 Philip D. Curtin, “Syllabi: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orld History Bulletin*, Vol. 15, No. 1, 1999, pp. i - xi.

③ Philip D. Curt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④ Philip D. Curtin, “Centered on Teaching”, *World History Bulletin*, Vol. 15, No. 1, 1999, p. i.

⑤ 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375页。

⑥ Philip D. Curtin, “Foreword”, in Michael Adas, *Prophets of Rebellion: Millenarian Protest Movements against the European Colonial Order*, p. xii.

⑦ Craig A. Lockard, “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ip Curtin and the ‘Wisconsin School’ 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p. 63; Philip D. Curtin, *On the Fringes of History: A Memoir*, p. 189.

⑧ 柯丁的学生还包括劳伦·本顿(Lauren Benton)、海伦·惠特利(Helen Wheatley)等人,约翰·麦克尼尔受柯丁的影响很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柯丁的学生。参见 Craig A. Lockard, “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ip Curtin and the ‘Wisconsin School’ 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pp. 62 - 65; J. R. 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肖尼斯·R. 柯蒂斯、杰里·本特利主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李俊姝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5页。

## 二、柯丁的比较世界史研究实践

菲利普·柯丁除了在教学上运用比较世界史方法获得极大成就之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重要的践行者。柯丁的比较世界史研究与教学密切相关,相得益彰。研讨班是柯丁授课的主要形式,他分专题列一些书目,然后引导学生就某一专题展开开放式的讨论。<sup>①</sup>柯丁课堂上讲授过的专题包括“跨文化贸易”“种植园”“西方的扩张”和“现代化”,等等。他本人对这些专题十分熟悉,沉潜几十年,皆有相关专著面世,此处介绍几本代表作。

《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是柯丁第一部“直接介入世界史讨论”的专著,出版于1984年。<sup>②</sup>柯丁在开篇就提到跨文化贸易的重要性,他说“跨文化领域的贸易与交易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抛开军事征服不可估量但略显消极的影响不说,它可能是引起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sup>③</sup>在柯丁看来,跨文化贸易之所以重要,与前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贸易离散社群(trade diaspora)有关。在该书中贸易离散社群指因跨文化贸易而形成的流散且相互联结的网络社会,家庭和族群关系是贸易社群团结的主要纽带。比如,上古时期地中海的腓尼基商人和希腊商人、中古时期印度洋的阿拉伯商人、东南亚的华人。柯丁比较了从上古到现代早期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贸易离散社群,涉及范围地跨非洲、欧亚大陆、印度洋和美洲,并就贸易离散社群与当地主流文化、其他文化以及内部之间的文化互动抽象了若干模式,呈现出了更广泛的人类发展图景。<sup>④</sup>就研究的视野而言,该书可以媲美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后者早一年出版。两位学者都主要关注跨文化贸易,涉及的广度也极为相似,包括非洲贸易、东方贸易、北美贸易、欧亚大陆贸易;都强调世界不同地区的联系,以及非西方社会的主体性作用。<sup>⑤</sup>也许柯丁不善于理论建构,该书在影响力上不如后者。

《种植园复合体的兴衰》一书聚焦于世界范围内的种植园复合体(plantation complex)。柯丁之前的种植园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多局限于区域史研究,呈现碎片化趋势。柯丁打破了纯粹治地中海史、非洲史、拉美史、欧洲史、美国史的研究范围,综合考察中世纪到现代的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世界,甚至南太平洋地区的种植园社会,全景式地再现了种植园体制的兴衰过程。柯丁使用“种植园复合体”这个概念,旨在表明这种政治经济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全球性。<sup>⑥</sup>

《致命迁徙:19世纪欧洲与热带世界的相遇》与《疾病与帝国:欧洲军队征服非洲期间的健康问题》是两部全球医疗史杰作。<sup>⑦</sup>医疗史的“全球转向”已经蔚为壮观,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和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被视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但是,柯丁的这两部著作明显被低估了。<sup>⑧</sup>这

① Philip D. Curtin, "Graduate Teaching in World History", pp. 84-87.

② 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74页。

③ 菲利普·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前言”,第1页。

④ 菲利普·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前言”,第2页;杰里·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⑤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⑥ Philip D.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⑦ Philip D. Curtin, *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sease and Empire: The Health of European Troops in the Conquest of Africa*.

⑧ 在学者当前对全球医疗史的学术史梳理中尚未见到这两部著作。参见蒋竹山《“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张忠祥《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两部著作延续了早期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一项人口统计》的风格，运用大量的档案资料进行定量研究，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sup>①</sup>柯丁比较了19世纪英法本土军队与热带远征军的死亡率，认为英法热带服役人员的死亡率明显高于本土军队，传染性疾病是造成高死亡率的主因。他通过统计发现，热带服役人员的死亡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次下降。然而，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重大进步。显然，这次死亡率下降与医疗技术的进步关系不大，柯丁推测，原因可能来源于一套行军经验，比如搭建帐篷防蚊虫叮咬、改善饮水供应条件，等等。柯丁发现，随着19世纪后期新帝国主义的推进，英法军队直接进入非洲热带内陆，因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又大幅度攀升，甚至高于战斗减员一百多倍，从这方面看不出医疗水平的进步。柯丁认为，医疗水平的进步在英法征服非洲的过程中尚未体现，医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医疗水平的提升确实在以后降低了英法殖民统治的成本。柯丁这两部著作出版时间间隔为九年，主题一致，而且都试图回应技术史学家海德里克提出的著名观点，即包括医疗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例如奎宁的应用有助于欧洲人征服非洲。显然，在柯丁看来，海德里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柯丁通过比较19世纪英法军队在热带地区死亡率的变化，透视了全球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历程，尤其是关注到历史学者常常忽视的殖民地的卫生状况，体现了比较世界史的宏大视角。

柯丁的《世界与西方：帝国时代欧洲的挑战与海外世界的反应》是其本科生课程“世界与西方”的结晶。正像书名所示，本书讨论的主题是“西方的扩张与非西方的反应”。实际上，这一主题更适合比较世界史方法，西方的扩张与非西方的反应是近几百年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参与进来，其中具有可比性的跨文化现象更是不计其数。而面对如此宏大的主题，柯丁没有写成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那样的通史性概述，也没有像沃勒斯坦那样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柯丁仍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比如，他在书中用一个小节具体比较了英国殖民地孟加拉和马来亚、俄国殖民地中亚和荷兰殖民地爪哇的行政管理技术变迁，发现19世纪它们都出现了从与当地精英合作的间接统治到国家直接统治的变化，而这一过程在宗主国发生得较早，因此揭示了同一时期全球行政管理技术的深刻变迁过程。<sup>②</sup>

讨论“西方扩张和非西方反应”这一主题很容易掉入“冲击—反应”模式的陷阱。<sup>③</sup>柯丁也坦言，叙述西方霸权时代的世界史很难做到不偏不倚。<sup>④</sup>尽管如此，他试图避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也许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目的，但书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值得借鉴。例如，他提到“欧洲之外不同地区的文化变迁步伐与内部一样快，尽管经常是出于欧洲威胁的直接反应，而且，在欧洲帝国崩溃之后，非欧洲地区的文化变迁得以持续，甚至是加速的。”<sup>⑤</sup>他还提到，现代化不是一个均质化的存在，它包含不同地区的不同选择，跨文化借鉴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创新。<sup>⑥</sup>显然，这些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冲击—反应”模式。

① Philip D. 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② 查尔斯·蒂利论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国家由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柯丁的视角超出了欧洲。参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费正清等人在解释中国近代史发展动力时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已经受到了批评。参见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 Philip D. Curtin, "Preface", 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p. xi.

⑤ Philip D. Curtin, "Preface", 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p. xiii.

⑥ Philip D. Curt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p. 110.

柯丁的这几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他首倡的比较世界史方法。考察的主题如历史上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贸易”、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种植园复合体”、西方国家的扩张与非西方地区的反应,包含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转型等都属于多重维度的跨文化或跨区域现象。柯丁采用比较的视角对它们进行个案化处理,因此,相关研究不管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跨度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同时历史的细节描述亦十分突出,比如东南亚布吉人的贸易离散社群和加纳的独立之路在通史概论性的著作当中绝不可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sup>①</sup> 个案研究的使用,有效地将世界史的宏大视角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使得世界史研究得以实证化,正如他的学生帕特里克·曼宁所评价的“他的著作使得世界史学科成为一个对历史研究来说具有实践意义和可行的领域。”<sup>②</sup>

### 三、作为世界史研究方法的比较

20 世纪的历史学既受到社会科学的挑战,也受其推动,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因而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取向。比较世界史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是排斥的。柯丁一直提倡跨学科的方法,他培养博士生的“比较世界史”项目就极力推崇人类学的方法,重视文化的影响、传播和跨文化互动。<sup>③</sup> 但是,总体来说,比较世界史最大的特色是将比较的方法引入世界史研究,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比较世界史的方法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结合比较视角与互动视角,寻求历史研究更大的空间框架。世界史研究的空间单位包括跨国的、跨区域的,甚至是洲际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sup>④</sup> 但是比较世界史的空间可能更大,更能把世界史的特点发挥出来。曼宁曾提到,如果历史学家把城市描述为“点”,没有维度;将两城之间的距离描述为“线”,属于一维;那么,历史研究的空间很少达到二维。<sup>⑤</sup> 比较世界史的空间便是二维的,因为它研究的对象至少分布在三个不同文化的“点”上。柯丁早期探索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史涉及的研究空间就包括欧洲、美洲和非洲,后来的研究主题如“跨文化贸易”“种植园复合体”“疾病与帝国”“世界与西方”等视角扩大到太平洋、东南亚、南亚、欧亚内陆等地区,而且在同一个主题下同时观照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区。可以说,除了历史哲学或者概览性的通史类著作,只有将比较视角和互动视角结合起来的比较世界史才具备如此广阔的叙事空间。

第二,跨文化历史现象的可通约性强,增加了历史比较的可比性。长期以来,大部分历史学者对比较方法持审慎的态度。著名法国中世纪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 1928 年就曾提及历史学家不信任“比较史学”,往往视其为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的一部分,认为研究者“时而推崇,时而报之以怀疑的微笑,但他们通常却避免将之用于实践当中”。<sup>⑥</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重新重视

① 菲利普·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第 151—169 页; Philip D. Curt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pp. 253—273.

② 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 76 页。

③ Philip D. Curtin, “Graduate Teaching in World History”, p. 83.

④ 杰里·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杰里·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 45 页。

⑤ 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 314 页。

⑥ 马克·布洛赫《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齐建华译,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3 页。

了对比较方法的应用,但却遭到历史学者更加严厉的批评。<sup>①</sup>

在众多的批评中,可比性或者说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问题无疑是比较史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比较研究的可通约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sup>②</sup>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同时代且相互间影响较少的比较对象,甚至同一时代不相邻的社会,可通约性问题更是十分明显。布洛赫为了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历史比较的可行性,将比较范围大大缩小,认为应该“平行地研究那些既是相邻的、又是同时代的社会,它是一些互相之间不断影响的社会”。布洛赫还认为“正因为它们的同期性和相互邻近性,所以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曾受过同样重大原因的作用,并且可以追溯到——至少可以部分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布洛赫寻找到的最佳样本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因此他说:“科学地讲,其范围窄者反而更卓有成效。”<sup>③</sup>

柯丁的比较世界史方法很大程度上符合布洛赫提出的“同期性”和“相互影响”原则。不同的是,柯丁打破了布洛赫“邻近社会”才能产生影响的假定。在布洛赫研究的中世纪史中非临近社会特别是跨区域的异文化区彼此影响较小,但柯丁关注的早期现代史和现代史跨区域互动越来越频繁,布洛赫的“邻近社会相互影响”的原则自然可以突破。事实上,柯丁也是这么做的,他在跨区域的甚至洲际的空间内寻找共同的影响因素,以此建立可以比较的链条。也就是说,比较世界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存在一个共享的结构,它们依赖于某一个事物或者事件,或者拥有共同的起源。对于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来说,主要的共享结构是西方的扩张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运动,柯丁关注的主题“奴隶贸易”“种植园复合体”“热带地区的征服”“非西方社会的回应”都属于这种共享的结构。因此,柯丁的比较世界史研究突破了比较范围越窄越有效的限制,证明大范围的历史比较是可行的,而且可以依靠大量的经验数据进行个案研究。这正是历史比较与社会学比较的主要区别。

第三,基于经验研究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如今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柯丁能够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反映了其前瞻性的史学视野。况且,他倡导的比较世界史方法还具有范型意义。因为,相比于依附论、后殖民主义学者的理论性批判,柯丁的批判往往基于经验研究。柯丁一生治学都在避免构建任何世界史的“宏大叙事”。<sup>④</sup>他的学生劳伦·本顿在刚接触柯丁的课程时抱怨他完全没有“理论观”,甚至一度计划中止选修柯丁的课程。本顿坚持下来才逐渐了解柯丁深层的框架。<sup>⑤</sup>这就包括柯丁建立在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柯丁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强调西方与非西方的联系,并突出非西方地区的主体性作用。

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批评西方史学的宏大叙事忽视所谓“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他采用联系的视角将非西方世界特别是非洲、美洲、亚洲的原住民的历史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过程之中,认为世界是“一个总体,一个整体和一个系统”。<sup>⑥</sup>这种理念与柯丁的理念是相契合的。柯丁也提到“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来观照世界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

① George Steinmetz,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Its Critics: A Genealogy and a Possible Solution”, in Prasenjit Duara,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eds.,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4, pp. 421–422.

② 刘家和陈新《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George Steinmetz,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Its Critics: A Genealogy and a Possible Solution”, pp. 416–421.

③ 马克·布洛赫《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07页。

④ Patrick Manning, “The Monograph in World History: Philip Curtin’s Comparative Approach”, *World History Bulletin*, Vol. 15, No. 1, 1999, p. 14.

⑤ 劳伦·本顿《法律与世界历史》,肯尼斯·R.柯蒂斯、杰里·本特利主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第149页。

⑥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450页。



那些不那么成功、不那么强大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一直被忽视。”<sup>①</sup>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上，柯丁一贯地坚持这一理念。比如，他十分重视非洲本土的贸易传统，传统的观点认为西方人到来之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商业，非洲人的商业活动是欧洲人开辟的。柯丁批驳说“在村落级别以上地区所进行的贸易都有其本地化、非洲化的开始。”<sup>②</sup>印度尼西亚布吉人的贸易史同样得到柯丁详细的叙述，并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布吉人直到18世纪下半叶依旧可以与荷兰公司抗衡，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同荷兰军队对抗。”柯丁同时指出，直到18世纪后半叶，亚洲人进行的亚洲贸易要比欧洲人多得多。<sup>③</sup>这些案例研究恰恰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有力的史实证据。

总之，柯丁虽然青睐经验证据和个案研究，但是他的比较世界史方法却是完整的，自成一家之言，他本人也进行过简单的总结。<sup>④</sup>基于此方法，柯丁开拓了世界史的研究领域，为世界史研究的实证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大量的世界史学者，还曾主持出版了一套“比较世界史”丛书，扩大了世界史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他的工作塑造了一种独特的世界史研究范式。在柯丁等诸多学人的努力下，世界史从边缘进入主流，并以全球史的名义大行于历史学界。然而，相比其他先驱人物，柯丁的研究方法也许更为重要。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综合性著作，长于宏大叙事，失于微观研究；沃勒斯坦的理论过于庞大，且富有争议。<sup>⑤</sup> 克罗斯比的全球环境史、疾病史囿于专题限制，而柯丁的比较世界史方法既有极其宽阔的视野，又便于个案分析，并且不限于某种专题，可以广泛吸纳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故而充满活力，在当今的全球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sup>⑥</sup> 这种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认可。于尔根·科卡鼓励将交往史方法和比较史方法结合起来，视作历史学家当前的一项任务。<sup>⑦</sup> 彭慕兰也认为只有通过把比较和联系结合起来，世界史才能对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产生充分且应有的影响。<sup>⑧</sup> 这些都表明，比较世界史方法具有广阔的实践空间。

(作者魏孝稷，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邮编：230039)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Philip D. Curtin, "Preface", 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p. xii.

② 菲利普·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第14页。

③ 菲利普·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第169页。

④ 参见 Philip D. Curtin, "The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Approach",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18, No. 4, 1985, pp. 520 - 527; "Graduate Teaching in World History", pp. 81 - 89.

⑤ 相关争论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6—299页；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322—324页。

⑦ Heinz-Gerhard Haupt and Jürgen Kocka, eds., *Comparative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Central European Approaches and New Perspectives*, Berghahn Books, 2009, p. 21.

⑧ 彭慕兰《没有大分流？通过东亚研究抵达世界史》，肯尼斯·R. 柯蒂斯、杰里·本特利主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第111页。

depth research. Two importa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addressed are how to write global history by scholars who embra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how to construct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he Spatial Turn in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 Li Wenshuo**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originated in the 1940s and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ince then, few historians have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urban historians, whil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m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cities.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numerous studies.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tial turn” in Western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neo-Marxism,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urban spatial changes in the academia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has turned to spac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space is no longer the site where research objects are located, but space itself also become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cale of research, historians are adopting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urban history through the flowing of personnel, material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The spatial turn has not only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issues, but also broadened the scope of urban history. It is a good source of reference for studies of American urban history in China.

### **Exploring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 Xu Yi, He Fenglu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about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of countries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fter 2000.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constructing various th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atabases to quantify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Based on these databases, they have also establish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model to account for the origi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cause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se new database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oday's global unequal economic system. A reassessment of studie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global economy in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widening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studies of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 **Philip Curtin's World History Study and His Comparative Approach // Wei Xiaoji**

Philip Curtin is a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new world history. Since the 1960s and 1970s, he has proposed a comparative approach on world history against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histories and the superficiality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world history. He has made prominent achievements in studies of issues such as cross-cultural trade, plantation, expansion of the west, Atlantic history, global migration history, and global medical history, and provided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studying world history using case studies as method of analysis. Moreover, Curtin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world history scholar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program, and many of them have formed today's leading force of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Philip Curtin's comparative approach on world history in China today.

### **The Kuomintang Leftist and the Conception of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China // Zhao Lidong**

To interpret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is a basic concept.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is concept are constrained by certain stereotypes, and they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based on sourc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onception of this idea seems more complicated than previous views. With a scrutiny of documents from the Kuomintang lefti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 was this leftist faction that ha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before the great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carried out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elucidation.